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Xianbei

鲜卑起源、 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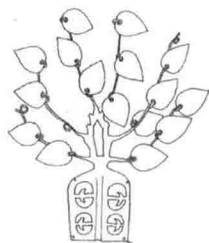
吴松岩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Xianbei

鲜卑起源、
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吴松岩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卑起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 吴松岩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25-8778-0

I. ①鲜… II. ①吴… III. ①鲜卑—考古—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352 号

鲜卑起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吴松岩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778-0

K·2458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的出版得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CKG006）

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项目资助

序

此作源自作者的博士论文《早期鲜卑墓葬研究》。作者吴松岩原是吉林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后念我的硕士,2007年经考试录取又继续攻读博士。整个学习期间,她一直很努力。在校全职学习,按规定博士是三年毕业,但是我开始曾想她三年或四年都可以。结果三年后,吴松岩写出了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感到满意,我当然也很高兴。我原来之所以有四年的想法,还是与论文的选题有关系。吴松岩来自内蒙古包头,对北方草原民族,尤其是鲜卑很感兴趣,选作此论文题目,是她主动提出的。而我对鲜卑了解不多,只是讲“魏晋—隋唐考古”基础课时给学生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和发现。吴松岩提出该选题后,我表示同意,同时又指出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文章的结构、重要的结论,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而具体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主要靠她自己。最后论文的顺利完成,说明作者具备了对较大型课题的考察视野和独立研究的能力。

和原论文相比,本书的整体结构没有变动。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墓葬,根据墓葬的分布,本书将其分为四个大区。在分区之前,首先对墓葬类型进行了统一划分,然后依次对各区墓葬的葬俗、器物、年代及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考察,最后对区与区之间进行相互比较、综合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变化,并进一步探讨鲜卑早期不同部族的起源、迁徙和流向。在各项分析与探讨中,注意到同文献记载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相结合。全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文字简洁通顺。论文写完之后,由于各地考古工作在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论著也有发表,所以这次出版,增加了新发现的材料,以及对相关新旧材料所产生的一些新认识,因而原论文中的具体分析和看法,有的则进行了补正和充实。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于汉唐之间的北半部中国乃至全国时局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鲜卑族一直是该时期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马长寿先生和宿白先生的研究。鲜卑族在几百年之中从弱变强,逐渐发展壮大,是由多个民族聚集融合而成的,在不同时期其内部又分成不同的部族。马长寿先生将其统分为东部鲜

卑和拓跋鲜卑,现已在学术界约定俗成,为多数学者所沿用。就考古而言,由于鲜卑族分布地区过大,所以分区考察是必要的。在划定分区范围和分区之后,对于涉及的同时期的若干遗迹,哪些是鲜卑的,哪些不是鲜卑的,是首先要鉴别确定的;鉴别确定为鲜卑的遗迹后,还要进一步区分是东部鲜卑的还是拓跋鲜卑的。这两个过程都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所以至今仍有不少遗迹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议。遗迹所属确定之后,又要集中考虑不同部族发展过程中活动地区的变化和迁徙过程,其中特别是拓跋部的迁徙过程和路线,一直是广大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在上述各个研究时段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鲜卑族与周邻民族以及鲜卑族内部之不同文化因素和人口的交流融合,此又关系到探讨鲜卑族内不同部族来源的重要问题。

本书在对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中,总结、吸取以往成果,有的问题进一步扩展深化,有的则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比如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是否同源的问题,本书重申非同源的观点,认为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草原形成时期,与周边地区即存在着文化交流和人群移动,其中西边的外贝加尔地区与本地区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为学术界探讨拓跋鲜卑的起源同匈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探讨拓跋鲜卑的迁徙问题中,作者原认为拓跋鲜卑从呼伦贝尔迁至蒙古高原,然后再南下“匈奴故地”,之后注意到西辽河上游苏泗汰墓地和南宝力皋吐墓地新的发现,对南杨家营子墓地重新解读,于是对另一条从呼伦贝尔地区经西辽河上游到“匈奴故地”的路线留有余地,这还是可取的。因为解决该问题的考古材料还存在缺环和空白,有不少情况并不清楚,所以思考问题多留一些空间,没有坏处。还有把西辽河上游地区前段推定为退居鲜卑山的东部鲜卑的遗存,将晚段和大凌河流域的发现,对照文献记载,推定为慕容部建立政权前在此区域内来回游动时所留下的遗迹,则很有新意。

这些年来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鲜卑族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一些突破,比如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自宿白先生的论著发表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论著,本书的出版无疑是为此类研究增添了新的重要成果。这几部论著,研究的材料基本相同,而对材料的分析和看法,有的是一致的,有的则不一致,这都是正常的,只有不一致和争议,才能推动研究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在此也希望吴松岩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关注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动态,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收获。

魏存成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2
第二节 发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6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相关说明	17
第二章 墓葬形制的类型学分析	19
第三章 墓葬分区研究	26
第一节 呼伦贝尔地区	26
第二节 西辽河上游地区	55
第三节 内蒙古中部地区	71
第四节 大凌河流域地区	92
第四章 各区域间的联系及差别.....	105
第一节 各区墓葬比较.....	105
第二节 I 区与Ⅱ区早段遗存之间的关系.....	113
第三节 I 区与Ⅲ区之间的关系.....	117
第四节 Ⅱ区晚段与Ⅳ区之间的关系.....	122
第五节 Ⅲ区与Ⅳ区之间的关系.....	124

第五章 早期鲜卑源流探寻	127
第一节 拓跋鲜卑的起源、迁徙及发展	127
第二节 出自东胡之鲜卑的发展	139
第三节 鲜卑诸部落不同的发展轨迹	145
第六章 结语	147
附录一 早期鲜卑遗存考古发掘情况一览表	151
附录二 嘎仙洞祝文石刻	155
参考文献	157
后记	166

第一章 绪 论

公元1世纪末匈奴分裂衰微,鲜卑继之而起。至魏晋时期,鲜卑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民族之一,十六国时期鲜卑陆续建立过许多政权,包括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西燕、吐谷浑及代(北魏)。最后更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进入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之后,鲜卑鲜见于史册,但这绝不是鲜卑民族的消失,而是孝文帝锐意推行改革,加速了鲜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扩充了汉族的内涵。

鲜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对鲜卑起源、发展等早期历史知之甚少。一是鲜卑没有自己的文字,早期事迹只见于中原王朝的史籍中;二是鲜卑地处边疆,早期与中原王朝缺乏直接的联系,直至东汉初期(公元49年)才与汉朝通使。最早为鲜卑立传的是《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除此之外,《魏书·序纪》追溯了拓跋鲜卑的世系渊源,《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以及《北史》也有零散记载,这些史料成为研究鲜卑民族早期历史的重要基础。但是古代文献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比较零散、模糊,另一方面又不够客观,有的粉饰历史、牵强附会,如《魏书·序纪》将拓跋鲜卑的祖先追溯为黄帝少子昌意,有的则对异族刻意贬损,如《宋书》称拓跋鲜卑为索虏,致使种种问题难以深入探讨,无法全面了解鲜卑起源、发展的历史面貌。

考古材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这些局限,逐渐成为研究鲜卑民族起源、发展的重要部分。本书将通过对鲜卑遗存的考古学分析,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对鲜卑早期的物质文化、渊源流变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一般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1],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致使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发现居住址之类的遗存,最主要的发现就是墓葬。因此本书以墓葬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引用的墓葬材料截止到2016年底。

一、鲜卑民族内涵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鲜卑成分非常复杂,马长寿先生按部落起源的地区以及同其他部落融合的情况,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2]。他认为早期的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东部的鲜卑山,原系东胡部落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的鲜卑;后期的东部鲜卑是公元3世纪后叶分布在辽西地区的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拓跋鲜卑则是《魏书·序纪》中记载的源自草原东北角的大鲜卑山。此种分类方法一经提出,逐渐成为定义,直至今日仍被普遍使用。

对这种分类方法首次提出质疑的是林沅先生,他认为“东部鲜卑”是《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使用的权宜性分类名词,不能视为文化分类的概念。因为在史书中仅可找到“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只能说明段匹磾这个人是东部的鲜卑人,并不能把东部鲜卑作为鲜卑的分类概念,并且认为前期、后期东部鲜卑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因此,今后在考古遗存分析中,似乎不宜继续使用这个名词。而且从历史的实际看,从西汉一直到十六国时代,在中国北方除鲜卑外还存在多个游牧民族,这些民族都会对鲜卑发生影响。如果只有一个分成两大系统的观念,就难免要削足适履了^[3]。

韦正先生认为:“‘东部鲜卑’这个概念恐难以视为马长寿先生的独创,‘东部鲜卑’一词除林沅先生所说的见于《晋书·段匹磾传》,也见于别处,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末注引《魏略·西戎传》,因关系到‘东部鲜卑’一词的范畴,转引如下:‘费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费。始(东汉光武帝)建

[1] 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

[2]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3] 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言,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姚薇元先生认为此赏虏亡匿之地,与檀石槐时三分鲜卑之地的‘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西部相符,详见姚著《北朝胡姓考》宗族十元氏条。如姚薇元解释不误,依《魏略·西戎传》,是否可作这样理解:檀石槐本分其地为东中西三部,后世著称的鲜卑三大支宇文、慕容、拓跋大约分属东中西三部,北魏立国后,自然以拓跋为主轴,遂将东汉时期的东中两部省称为东部鲜卑,檀石槐时期以地域为经的划分方式,经此调整具有了较多的族类色彩。马长寿先生所说的‘东部鲜卑’包括檀石槐时期的东中两部,现在大多数学者也按照这个内涵使用这个概念,可以说不无根据。”〔1〕

但笔者对韦正先生的上述解释有一点质疑,即陈寿撰写《三国志》依据的基本材料之一是鱼豢的《魏略》,《三国志》的成书年代虽然不能确定,但是陈寿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三国志》成书年代就必定早于公元297年,则《魏略》成书年代更早,而拓跋鲜卑建国是在公元386年,“北魏立国后,自然以拓跋鲜卑为主轴,遂将东汉时期的东中两部省称为东部鲜卑”似乎说不通。笔者认为“东部”更像是相对的地理方位词,因此本书遵循林沅先生提出的不宜在考古遗存分析中使用“东部鲜卑”作为鲜卑分类概念的观点。文中将源自东胡部落联盟,最初位于内蒙古东部草原的鲜卑,只称为鲜卑;源自“大鲜卑山”的称为拓跋鲜卑。

二、时空范围

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公元1世纪末,匈奴南北分裂,外加东汉王朝的打击,北单于西遁,匈奴势力更趋衰败,“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至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2〕。虽然不久之后联盟瓦解,但各部鲜卑仍然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之后五胡列国中的主要角色,并且都建立了封建政权。

本书研究鲜卑起源、发展的历史,重点即鲜卑早期的历史,故以各部鲜卑建立封建政权作为研究的年代下限。拓跋鲜卑以建立北魏政权(公元386年)为限,慕容鲜卑以建立前燕(公元337年)为界,考察的时间范围大致在东汉至北

〔1〕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第350页注3。

〔2〕 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6、2989页。

魏建立止,即公元前后至公元4世纪晚期。将下限划定在此,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建立封建政权之后,其典章制度多仿魏晋旧制,为充实国都,又将大量外来人口迁至都城,人群成分复杂、文化因素多样,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受到汉族以及周邻民族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北魏定都平城期间,常被称为“北魏平城时代”,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表示年代,二是定都平城时期形成的独特文化面貌。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建立前燕之后,又陆续建立过后燕以及鲜卑化汉人冯氏建立的北燕,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比较独立的研究领域——“三燕文化”研究,田立坤先生曾明确指出“三燕文化与鲜卑文化并不完全相同”〔1〕。选择的两部鲜卑的年代下限不同,主要是考虑到不同部族、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鲜卑成分非常复杂,除广为人知的拓跋部,以及分布在辽西地区的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外,还有俗称西部鲜卑的乞伏部、秃发部,与慕容部同祖分布于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魏晋时期鲜卑是北方地区最活跃的民族,迁移的脚步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北方,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并没有发现或很难辨识出西部鲜卑遗存〔2〕,而吐谷浑原为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的庶长兄,公元3世纪后期率部西迁至阴山,公元4世纪初到达青海地区,与羌人杂居,后以吐谷浑为族名以及政权名,成为西北地区很重要的民族,这表明吐谷浑到达青海地区后已与鲜卑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因此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也不列入本书研究的范围。

综上,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拓跋鲜卑、慕容鲜卑的早期考古学文化,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了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南部、中部,河北、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邻界地带,以及辽宁大凌河流域一带(图一)。

三、材料的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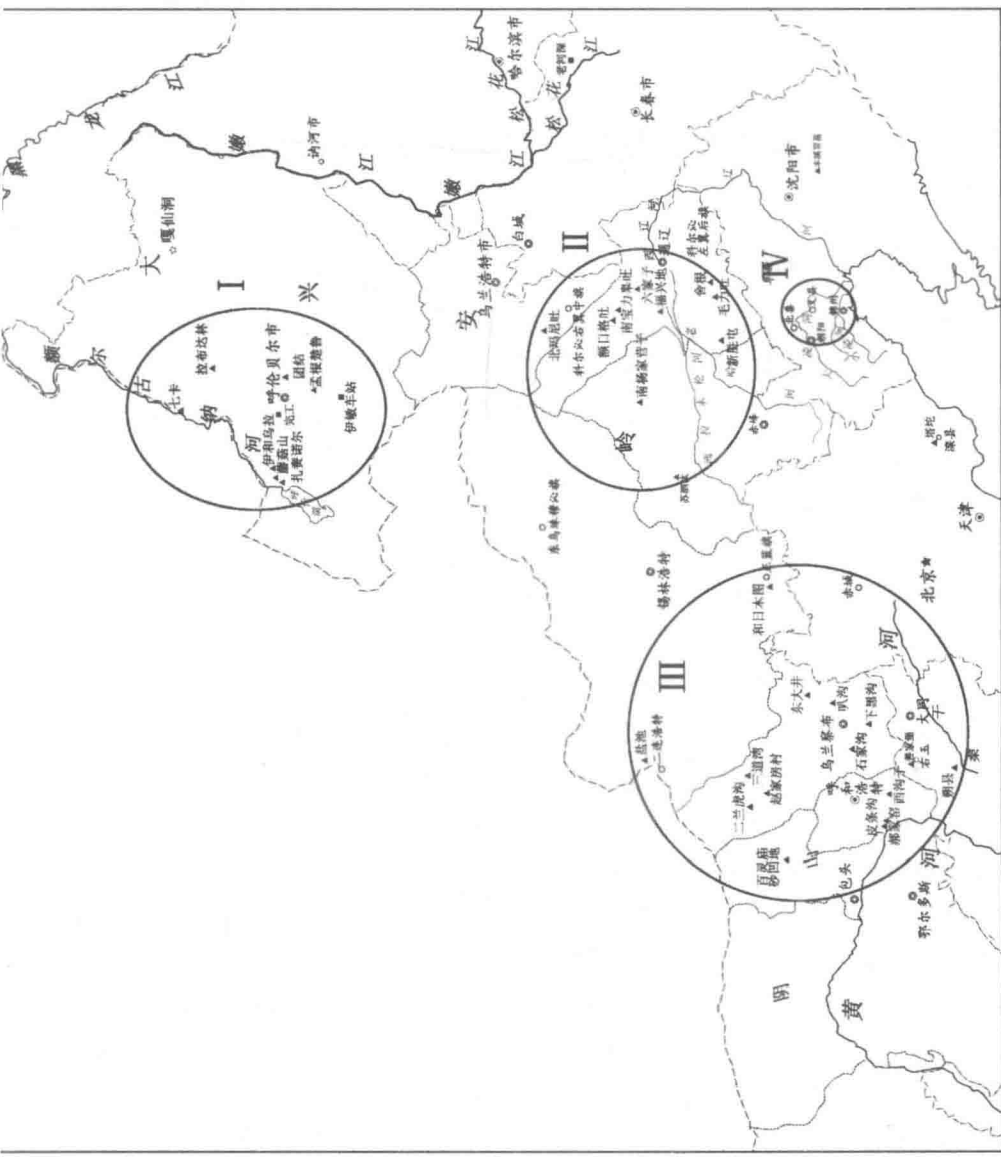
中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融合混杂的区域,相似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某些共性,有时也会体现在墓葬中。本书对材料的选取分三个层次。

1. 学术界公认的、几乎无异议的鲜卑墓葬。

2. 性质比较模糊、存在争议的墓葬。本书将通过具体分析,对其性质进行再判断,属于此类的墓葬主要有:南杨家营子墓地、七郎山墓地、大饭铺墓地、补洞沟M6、二里半墓地等。

〔1〕 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第11期,第30页。

〔2〕 吴荏、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文中通过与典型鲜卑墓葬的对比,甄别出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部分含有鲜卑因素的墓葬。但资料有限,还不足以对西部鲜卑作进一步研究。



图一 鲜卑墓葬分布示意图

I. 呼伦贝尔地区 II. 西辽河上游地区 III. 内蒙古中部地区 IV. 大凌河流域地区

3. 曾经误认为是鲜卑遗存,后经多数学者研究分析,性质已经比较明确的墓葬,将不列入本书的研究范畴。属于此类的墓葬主要有:完工墓地、榆树老河深中层遗存、伊敏河墓地、吉林大安渔场墓地、吉林通榆兴隆山墓地等。

第二节 发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文献史学研究

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前,鲜卑历史的研究主要是文献史学家进行的,早在19世纪末,即有学者利用文献考证和比较语言学来研究鲜卑起源等问题。清末张穆的《蒙古游牧记》^{〔1〕},对文献中有关鲜卑起源及早期活动的地点进行考证,认为鲜卑山位于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右翼中旗西,这个观点到今天仍在沿用。利用比较语言学来研究的多是当时的外国学者,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2〕},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之作,书中首辨东胡与通古斯之同异,遍考东胡诸族之种类、地名、语言、姓氏等。但由于比较语言学者个人研究角度不同,可比较的语言有限,甚至有时“尤置重于各民族之语音,不分中外古今,强为比附”^{〔3〕},因此所得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史学界开始对鲜卑政治、经济基础及社会发展形态等方面给予了更多关注。代表作当属马长寿先生的《乌桓与鲜卑》^{〔4〕},书中对乌桓与鲜卑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各部分化及迁徙演变等论述甚详,明确提出了研究鲜卑的主要方向——起源问题(其中包括起源的地点和年代)、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的区别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以及各部鲜卑的迁徙问题等,他还注意到了当时的考古材料,认为以后对鲜卑诸多问题的解决,考古材料将起到重要作用。马长寿先生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的分类方法,几乎成为定义,至今还在沿用;提出的研究方向仍是我们努力探索的目标;研究成果到今天还具有重要意义。

继《乌桓与鲜卑》一书出版后的20年间,考古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考古学

〔1〕 张穆:《蒙古游牧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日]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

〔3〕 [日]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页。

〔4〕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的新发现也带动了鲜卑历史学的研究。这期间涌现了大量的历史研究著作,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各部鲜卑的早期历史以及迁徙等问题,其中林幹先生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东胡史》^[1]一书结合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鲜卑的源流、经济类型、社会组织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并就个别问题阐释了与马长寿先生不同的见解。

由于考古学材料能够提供更多在文献史料中无法找到的讯息,所以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逐渐成为研究鲜卑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考古学研究

(一) 考古发现

我国鲜卑的考古发掘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学者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包头市达茂旗白灵庙砂凹地 6 座鲜卑墓的发掘^[2]。

但科学发掘鲜卑墓葬则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60 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墓地的发掘^[3],虽然 1959 年已经对此处墓地进行了调查^[4],但通过这次正式发掘,对墓地的葬制、葬俗及文化性质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和认识;1961、1962 年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发现并清理了遗址和墓葬^[5];1963 年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发掘了完工墓地^[6];1969 年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发掘了赵家房村墓地^[7];在辽西地区发现并清理了北票房身村墓^[8]、义县保安寺墓^[9]。

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还是集中在 80 年代以后。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石刻的发现,洞内的石刻文字与《魏书·礼志》中的记载除个别字句稍有差异,内容基本是相同的,这一重大的发现使嘎仙洞成为追溯

[1] 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

[2] [日] 江上波夫:《内蒙古百灵庙砂凹地的古坟》,《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 年,转引自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 页。

[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2 期。

[4]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 年第 9 期。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 年第 1 期。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

[7] 盖山林:《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考古》1972 年第 2 期。

[8]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

[9] 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1963 年第 1 期。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甚至起源的重要坐标点^[1]。另外,鲜卑墓葬的发掘数量也大大增多,其中在呼伦贝尔市发现较多,且存在几处墓葬分布较为密集的墓地,如扎赉诺尔墓地,分别于1984、1986和1994年又进行了多次发掘^[2];额尔古纳右旗的拉布达林墓地,于1987、1992年进行了发掘^[3];2011年在距扎赉诺尔墓群10公里外的蘑菇山又发现了一处古墓群^[4]。在通辽市,通过普查确认了舍根墓地^[5],其他较重要的还有六家子墓地^[6]、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7]。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北玛尼吐墓地^[8]。乌兰察布市也是鲜卑墓葬比较集中的区域,在2004年出版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9]一书中即发表有三道湾、东大井等墓地,其他还有石家沟墓地^[10]、下黑沟墓^[11]等。在山西省、河北省也发现了可能是早期鲜卑的墓葬^[12]。在内蒙古中部及大同地区、辽西地区还发掘了大量北魏、三燕时期墓葬,这为追溯早期鲜卑考古学文化特征提供了可参考的基点,但由于这些墓葬已超出本书所定年代下限,因此在书中不作过多讨论(发现情

-
- [1]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44~452页。
 - [2] 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69~383页;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
 - [3]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年第10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84~396页。
 - [4]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内蒙古满洲里市蘑菇山发现古墓群》,《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满洲里市文物管理所、扎赉诺尔区文物管理所:《满洲里蘑菇山墓地发掘报告》,《草原文物》2014年第2期。
 - [5]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
 - [6]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 [8] 钱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97~405页。
 - [9] 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0] 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 [11] 郭治中、魏坚:《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34~436页。
 - [12]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雷云贵、高士英:《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0~147页;唐山市文物管理处、滦县文物管理所:《滦县塔坨鲜卑墓群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况详见附录一)。

(二) 考古学研究

早期鲜卑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研究成果丰硕,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 第一阶段 辨识期(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的考古工作刚刚展开,发掘数量有限,个别墓葬的资料又未能及时公布(如1958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葬,但材料却发表于1991年^[1]),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因此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或不敢贸然断定其文化属性,如完工墓地^[2];或就墓地的族属存在不同意见,如二兰虎沟墓地^[3],当时发掘者认为是匈奴遗存,在辽西地区虽然仅发现了北票房身村^[4]、义县保安寺^[5]两座墓葬,但也存在着鲜卑与乌桓的不同认识。这就引发了学者们对这类墓葬文化性质、族属的思考,尤其是扎赉诺尔墓地特殊的葬俗,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就该墓地的族属引发了一场讨论。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墓葬的发掘者为代表,认为扎赉诺尔墓地属于东汉末年鲜卑族的一支;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典型的匈奴文化遗物^[6];安志敏先生则认为在当时考古资料没有完全发表以前,探讨族属是有一定困难的,推断扎赉诺尔是鲜卑或匈奴都缺乏充分的论据^[7]。

这一阶段由于之前没有相关资料作参考,缺乏对鲜卑等北方民族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认识,对墓葬族属存在辨别不清的情况。但是这些墓地的发现,使学术界开始思考墓地的族属,通过讨论使鲜卑民族走进了考古学界的视野。

2. 第二阶段 确认期(20世纪70年代)

经过上一阶段资料的积累,宿白先生根据当时发现的与鲜卑有关的遗迹,撰

[1] 金学山:《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考古》1991年第5期。

[2]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第1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3] 郑隆:《内蒙文物工作组再一次调查二兰虎沟的匈奴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李逸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9~101页。

[4]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5] 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1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88页。

[7] 安志敏:《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文物》1964年第5期。